

论学术共同体视角下的学术年鉴功能演化

姜阿平*

摘要 学术年鉴是记录学科发展重大进展、学术成果及研究数据等重要信息的重要载体,与学术共同体共生共存。从国外经验来看,学术年鉴除了是记载学术共同体研究进展的“史书”之外,目前功能已经不断深化,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参考、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渠道和链接学术网络的重要载体。但是,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发育不足、政府相关部门重视不够以及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合理,导致共同体与学术年鉴的关联度和依存度不高、学术年鉴存在供给不足、功能相对单一的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共同体高度关注,破除体制机制束缚,共同推进年鉴的创新与发展,使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柱。

关键词 学术年鉴 学术共同体 功能深化

学术年鉴是记录与反映年度内自然科学、医学、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科学领域学科进展、学术成果、重大事件及有关研究资料的连续出版的学术工具书。^① 目前公认的首部学术年鉴是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1929年初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经过90年的发展历程,国外学术年鉴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力量,专业化和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分类越来越精细,功能不断深化,成为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根基和方向指引。

中国学术年鉴虽然起步较晚,不过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推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学科恢复发展所带来的客观需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十分迅速,在种类与规模上都有所扩张。但与“量”的扩张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学术年鉴在“质”的方面有待加强,突出表现为年鉴的功能发挥不足。目前的学术年鉴被局限在存史这一基本功能之上,亟须创新以实现突破。

* 姜阿平,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鉴与文摘分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术年鉴发展与创新。

① 张昊鹏:《中国学术年鉴发展报告》,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181页。

一、发达国家学术年鉴与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演化

(一) 学术年鉴的发展脉络:与学术共同体共生共存

《经济社会史年鉴》是目前被公认的首部学术年鉴。这部年鉴由一群有着共同学术信仰和学术观点的历史学家主持编纂,他们把年鉴作为宣传新理念和新方法的学术阵地,在年鉴中刊发多篇重要的理论成果,通过将社会史作为整体加以研究和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强调要对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给予充分的重视。他们提出的这些理论催发了史学研究范式的演化,对整个西方现代史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新的学术流派,被称为法国“年鉴学派”,也即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

《经济社会史年鉴》的诞生及发展凸显了学术年鉴与学术共同体共生共存、互为依托的紧密关系。此后,国外学术年鉴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创办和编纂学术年鉴的传统得以延续和发扬。随着国外学会及权威期刊等学术共同体形态的不断完善,年鉴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类也越来越精细,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二) 学术年鉴具有信息综合性与分类精细化特征

经过90年的发展历程,发达国家的学术年鉴与学术共同体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不断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提供学科情报的重要工具。年鉴通过学科综述概览、学术活动及动态、学术成果和学术人物等内容,将学术信息进行综合又详尽的展示,具有学术百科全书的作用,能够充分地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具有信息综合性的特征。

此外,近年来,发达国家专业年鉴的分类也更加精细化。这首先是因为,在长期历史传承作用下,由于出版和使用性消费的互动,这些国家的年鉴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精细化的分类也是为了适应发达国家的学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现状,更好地满足学术共同体的需要。^①精细化的学术年鉴群在结构上呈现一种“树形发展状态”,以一种学科门类为主干,可以产生一批分支学科,分支学科以下再生分支……如此类推,形成树状结构。比如日本学术年鉴的出版结构体系中,文学类年鉴共有36种,其中日本文学研究类年鉴占34种,其数量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②从国外经验来看,随着学术年鉴专业化与精细化发展,可以对某一学科门类提供专业对口的深度信息,越是分科精细的学术年鉴,所提供的信息就越精细,就有更强的针对性和使用价值。

(三) 学术年鉴的功能拓展

从国外经验来看,随着既定研究范式下研究主题的丰富、不同学科领域融合的加快,学术年鉴内容愈加丰富多彩,功能也不断深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四大功能:

1. 为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提供知识基础和发展方向

年鉴刊载的综述性、评论性和展望性的文章,除了为同一范式下的学者提供知识积累

^① 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中央文献出版,2000年,第290页。

^② 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第291页。

或索引外,还能够对学科发展趋势动向做出总结,这对于学术研究极其重要。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年鉴都有严格的质量监控机制,其综述性的文章甚至都需要通过同行评审才能被收录,能够保证年鉴收录的文章可以全面概括总结该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为学术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地点、研究理论和工具提供全面的参考,乃至为学科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2. 重要学术创见的发表渠道

欧美一些重要学术共同体的下属出版物的结构非常多样化,年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出版物,更是发表展示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甚至成为推动学术范式转换和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知识载体。很多年鉴被认为是该领域著名学者成果与观点的最重要的展示平台,比如前文提到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美国的《英语研究年鉴》(*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和欧盟的《欧洲法年鉴》(*Yearbook of European Law*)。《英语研究年鉴》是重要期刊《现代语言评论》的子刊,每份年鉴都会收集10余篇关于特定主题的约稿,对学科当下的一些热点如“现代媒体中的文学”“文学中的殖民和帝国”主题进行专题研究。《欧洲法年鉴》是欧盟法律方面的旗舰刊物,它以最高的学术标准收录文章,旨在对欧盟法律中的热点主题和经典问题进行全面而批判性的分析。被以上年鉴收录文章的学者均引以为荣,这些年鉴充分体现了鉴别学术良莠的评价功能。

3. 理论与现实链接的重要载体

这一功能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体现得更加明显,年鉴已成为实践案例、数据等事实的忠实载体。例如《英国国际法年鉴》(*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服务对象包括学术界和执业律师,所以除了综述性文章、重要著作书评等常规内容外,它还较全面地记载了英国法院判决和官方政府声明,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英国相关法律的实践发展,充分实现了年鉴的学术参考资料价值。

4. 学术网络建设的重要中介

当下,学科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学科交叉的融合速度加快,学术共同体的子共同体越来越多,各子领域之间、学科之间需要更多的交流、互动,以促进学术融合和知识增长。欧美很多年鉴编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在年鉴中提供链接与拓展学术网络这一功能。例如美国的政策研究组织(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利用《政策研究年鉴》(*Policy Studies Journal Yearbook*)这一平台,详细介绍了不同学科及领域内的国际政策研究著名学者,包括联系信息、专业领域、研究参考资料和学者个人对当前和未来研究兴趣的陈述。这不单单为未来研究项目和议题提供了参考,更有利于加强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学术融合。

除了这四大功能,学术年鉴在学术规范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治理等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鉴别学术良莠的有公信力的权威学术公报。

二、中国学术年鉴的发展现状与不足

(一) 中国学术年鉴发展历程与特征

中国的学术年鉴起步于1979年。随着拨乱反正与解放思想,中国曾遭受严重破坏的

科技、教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局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此契机下，中国首部学术年鉴——《世界经济年鉴(1979)》于1980年4月出版，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学术年鉴中历史最长的一部。1980年，《中国历史学年鉴》《自然科学年鉴》陆续出版，与《世界经济年鉴》一起构成了中国学术年鉴的第一方阵。^①毫无疑问，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与中国学科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强大是分不开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各类学科的快速恢复和发展，研究机构、高校等专业研究团体力量的壮大，各类学会、研究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专科性年鉴的种类迅速扩张，发展势头可观。据1992年《中国出版年鉴》统计，相比综合性、统计类和其他类型的年鉴来说，专科性年鉴发展最快，已有344种；其中，属于社会科学门类的专科性年鉴170种，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学科的有164种。^②另据统计，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地方社科院系统的学术类年鉴约有110种，截至2012年仍能保持连续出版的学术年鉴有92种。^③

在学术年鉴的发展历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由于充分认识到学术年鉴对于学科发展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3年开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整合学术资源，编制相关规定，倾力打造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年鉴系列，统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和发行。目前，这一系列已连续出版了包括中国首部学术年鉴《世界经济年鉴》在内的30种学术年鉴，基本覆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门类学科和一级学科，并向有发展潜力的二级学科积极拓展。

从中国年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官办”特征明显。中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地地方志编委会（或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编鉴格局。

学术年鉴作为一种专业年鉴，尽管其内容与各级地方综合年鉴存在区别，但在编纂主体与主办单位上也体现出“官办”特征。目前中国学术年鉴的编纂主体主要包括：科学院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党政系统、学会（协会）组织及个人。其中，个人私修的民办年鉴数量极少，另有少量年鉴依托学会或学会性质的研究会主办，比如《中国考古学年鉴》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中国城市年鉴》由中国城市研究会主办，《中国行政管理学年鉴》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绝大多数学术年鉴依靠的是学科内的龙头科研单位及其主办的学术期刊对学术资源的动员与整合能力。然而无论是学会、研究会亦或是科研单位或学术期刊，其主管单位仍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都有较强的行政色彩。

（二）中国学术年鉴发展呈现的不足

中国学术年鉴在经历了发展初期的快速扩张后，数量上已颇具规模。学术年鉴对

① 张昊鹏：《中国学术年鉴发展报告》，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第183页。

② 郭建平、赵全艾：《年鉴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国年鉴学术研究成果述略》，《编辑之友》2000年第2期。

③ 张昊鹏：《中国学术年鉴发展报告》，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第181页。

于记录学术发展史、促进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极为重要,其作为一种学术公共品,应是每个学科的基础配置。但目前学术年鉴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编纂力量与资源配置能力不足

首先,学术年鉴的编纂力量不足。以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系列为例,在目前已出版30种学术年鉴中,许多年鉴的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编辑部重合,编辑人员基本为兼职。比如,《中国社会学年鉴》的编辑队伍主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研究》期刊编辑部,《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的编纂力量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世界宗教研究》与《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而《中国经济学年鉴》的具体编辑工作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鉴分社的编辑承担。缺乏实体性编辑机构和专职编辑导致学术年鉴成为一种依附性和边缘性的存在。此外,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期刊的实效性更强且与现行学术考核机制关联密切,受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年鉴,其工作也就往往位列年鉴工作之前,尤其当编辑队伍紧缺时,年鉴的工作就更加难以开展。对编纂队伍建设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年鉴的发展与创新。

在资源配置方面,编纂学术年鉴的经费、人员开支、设备与办公地点等资源条件主要依靠国家或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或学术出版资助等,其运作方式是由年鉴编纂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挂靠的科研单位申请,经费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科研单位审批后划拨并监督实施。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缺乏主体性和自主性,既没有积极性进行投入,也没有设立监控机制。

2. 学术影响力不足

学术年鉴一般由编纂者在所记述年度的年末开始约稿并整理该年度的各类信息,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对稿件进行统稿后交出版社出版。但因目前学界对年鉴的重视不足,撰稿不积极,加之许多年鉴编辑都是兼职,面临着其他编辑业务的工作压力,经常把年鉴工作排在最后处理,致使年鉴拖稿现象严重。许多学术年鉴无法按年度及时出版,其总结出的学术新发展与新动向也就成了“旧识”,难以在学术界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学术影响力弱。

从发行情况来看,纸质年鉴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图书馆系统,学者个人购买率不高。学术年鉴数据库建设起步晚,无法获得全面的使用数据,但从学界的反馈来看,大多数年鉴的影响力并没有达到预期。许多学术年鉴从编辑到出版始终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甚至学界都不知道是否有相关年鉴在编辑出版,更不要说学术“走出去”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① 较低的学术影响力又反过来限制了主管部门或科研单位对学术年鉴的资源倾斜与经费支持,进一步降低了其编纂年鉴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 学术功能发挥不足

目前的学术年鉴功能相对单一,尤其是一些不能及时按年度出版的学术年鉴,更多强

^① 张昊鹏:《中国学术年鉴发展报告》,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第184页。

调其记录学科发展与学术成果的存史工具价值,而在支撑科研、凝聚共识、链接学术网络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不能有效满足学术共同体发展需求,与其共生共存,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知识基础和发展方向的指引明显不足。主要体现为:综述性文章水平相对不高。与国外年鉴对重要的综述类文章进行同行评议相比,中国尚缺乏对综述类文章进行学术质量控制的规范机制,导致目前的综述性文章水平参差不齐。低水平的综述类文章显然无法承担提供知识基础和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功能。

其二,尚未成为学术发表的重要渠道。年鉴收录的综述性文章和特稿还没有很好地嵌入到学术评价机制当中,这极大地影响了研究者的积极性,影响了年鉴整体的供给质量。这些专题约稿对于学术热点、争论以及经典主题的把握和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大多数年鉴的特载栏目都缺乏能够推动学科范式转换与理论发展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能够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稿件尚不多见。

其三,未能有效链接学术网络,促进学术融合。目前大多数年鉴依托单位相对单一,除了个别龙头性研究机构依托学会或者下设的专委会整合国内各子领域的学者进行编纂外,大多数年鉴的编制还未能做到强化学术研究网络,凝聚学者共识。

三、中国学术年鉴发展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学术共同体发育不充分

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学术年鉴的编纂主体都是学术共同体。但仔细分析国外与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的运作机制,我们会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别。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学术共同体是由学者们自愿结成的以专业为基础的学术团体,自主创办同人性质的专业刊物,自行召集学术会议,既可以依托学术团体,也可以由学术刊物或学者自己发起。这种由团体、刊物和会议所构成的组合性学术共同体形成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空间,成为学术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监督者。同时,学术共同体在经济上相对独立,无论是学术社团,还是学术刊物,在经济上都不依赖于政府拨款,也不单凭某个人的捐赠,而是依靠学者缴纳的会费以及其他社会性募捐。^①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发达国家的学会发育充分,力量强大,经济独立,资源配置能力强,由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组织编纂的学术年鉴,既是经过学术共同体自觉投入和质量监控的产物,又是刊发重要学术成果的载体和阵地,更能彰显其为共同体和学术建设服务的功能,在学术界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也更大。

目前,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尚不充分,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的独立性相对薄弱,资源配置能力有限。有些学会的治理结构涣散,缺乏专职工作人员和专业营运队伍,往往需要依靠上级主管部门的宏观指导和统筹才能运转。一些专业性的研究会或学术期刊往

^① 李剑鸣:《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往也要挂靠在科研机构下,或以党政系统或龙头科研机构(科学院系统、社科院系统或著名高校)为依托,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和挂靠的机构单位来获取自身运作的资源,如获取项目、场地支持、经费支持等。由于学术共同体自身发育不充分,其作为学术公共品供给主体的能力自然不足。

(二) 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重镇和龙头科研机构,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年鉴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对学术年鉴的评审与后期资助,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系列的连续出版,对学术年鉴的出版业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仅凭一院之力,扶持力度有限,从经费到编纂人员等方面尚不足以完全满足学术年鉴的发展需求,亟需政府有关部门加强重视、引导与投入。遗憾的是,目前有关部门既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术年鉴作为学术公共品,需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和统筹,也没有把它视作学术共同体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载体和阵地。学术年鉴也无法像其他学术科研成果一样得到国家科研项目资助。在现行的科研体制下,学术年鉴的地位与获取的资源远远不如学术期刊。

(三) 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一方面,学术评价机制对年鉴刊载的重要文献相对忽视。年鉴刊载的文章不列入科研考核评价体系,使得学术年鉴很难约到优质稿源。因此学术年鉴刊载的学术综述性文章多是对一年内学术发展成果或文献的罗列或简介,难见对学科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高水平研究。而稿源质量,尤其是学术综述性稿件的质量不高,又进一步限制了年鉴的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编辑学术年鉴、生产学术公共品的编纂与编务工作不受重视,甚至不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计入个人业务考评体系,导致参与编纂年鉴的具体人员收益极低。许多年鉴能够连续出版依靠的是编者的学术担当与责任心支撑。然而这种支撑相当脆弱,一旦更换编者或外界其他因素干扰,很容易导致编纂工作陷入停滞。

四、余 论

总之,通过梳理和比较国内外学术年鉴的发展脉络,可以基本归纳出学术共同体与学术年鉴的两种关系模式:外在型关系模式与内嵌型关系模式(见图1)。

西方学术年鉴从诞生伊始,便与学术共同体相互依存、互为依托、融合发展。随着西方学术共同体形态的不断发育,年鉴已深深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系统内部,在功能上不断拓展,成为学术共同体功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关系模式既强化了学术年鉴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基础地位,也促使年鉴随着共同体的发展不断深化拓展自身功能,更好地满足学术团体需求,成为科研的重要支柱。中国学术年鉴因学术共同体自身发育不充分、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学术评价机制不合理等因素制约,无法与学术共同体有机融合、协同发展,而是相对外在于学术共同体,仅作为一种记录学科发展状况与学术成果等学术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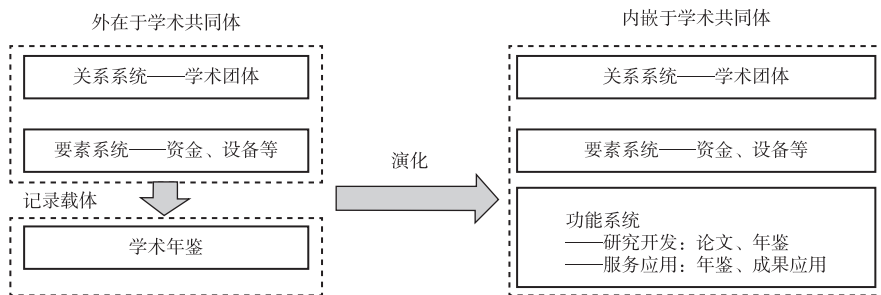


图1 外在型关系模式与内嵌型关系模式

的存史载体存在,客体性定位明显,而在支撑学术科研、链接学术网络等方面的主体性功能尚未充分展现。要实现中国学术年鉴的研究支柱功能,必须实现从外在型关系模式向内嵌型关系模式的演化。

中国的学术年鉴发展任重道远,它需要在强化基本的存史功能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深化拓展其对学术共同体发展所具有的其他功能,才能在学术共同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体制机制之变革,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壮大。学术年鉴的发展离不开其供给和需求的主体——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和壮大,但是目前我国学术共同体本身建设还受到各种体制机制的束缚。建议政府层面加大对学术共同体编纂年鉴的经费支持和资源倾斜,拓宽资源经费的申请渠道;充分调动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性,支持学术共同体在出版物建设特别是年鉴编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调整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将学术年鉴发表和记载作为考核评价、学术评奖等的重要指标;充分肯定编纂学术年鉴的工作价值,予以对等的工作酬劳。

其次,强化学术年鉴作为学术共同体重要出版物的地位,彰显其学术鉴定与评价功能。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多出精品,不断提高年鉴稿件的学术质量,使得年鉴在学术共同体学术声誉建立、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奠定学术年鉴作为优秀成果发表的重要载体地位。同时,在科学文化建设、学术自治自律等领域探索更多的形式,从而在学风锻造、学术共同体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多支撑与引领的作用。

最后,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中国学术年鉴舰队。建议政府和学术共同体立足国家发展和学科建设所需,选择有优势、有基础的学术年鉴进行重点打造,尽快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年鉴方阵,推动其走出去,发中国学术之声。

责任编辑:杨卓轩